

孤忠御史王度 灭族沉家以身许国

明代惠州出了近30位敢言直谏的御史言官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清

人孙能宽咏惠州表忠祠云：“灭族沉家志不歧，双忠湖畔合同祠。批鳞喋血都门日，守土捐躯蛮国时。”无论是御史王度的“批鳞喋血”，还是通判刘简的“守土捐躯”，都体现出一种许国精神，这是宋儒学说与岭南山水共同孕育出来的明代惠州的人文精神。

特别是王度，作为惠州历史上第一个被“灭族沉家”的御史言官，他“忠于所事而以身殉之”的忠诚品格，被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同时见重，可谓“孤忠”不孤。

王度之后，明代惠州学子登科入仕而成为御史言官者颇多；为御史言官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坚持法纪而不惜以身犯险丢官弃禄者更不在少数。

壹 传奇身世：因诗文被官员举荐

在惠州，明初被荐举授官者颇多，而其中之最著者，是在后来被誉为“孤忠”的监察御史王度。

王度，字子中，归善人，居东平坊（今惠城区），自少“肆力经文，稽理修辞”，学识不凡；但年过而立，还是一介布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派往藩司服役，藩司赏爱王度的才能器识，聘请他教授自己的儿子。

后来王度入仕的缘由就更具传奇色彩：据传那一年朝廷遣专使来广东祭南海神，当地官府设宴款待，王度应邀参加。酒酣之际，使者索诗助兴，王度即席口占数绝，其中《咏橄榄》诗云：“南海飞骑荐荔枝，谁知橄榄更清奇。只因托根寻常地，无自吹嘘上帝畿。”这使者也非平庸辈，听出了王度诗中的弦外之音，“遂以明经儒士荐，起家拜山东道监察御史。”

这一年为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王度34岁，正符合朱元璋提出的德才兼备、老成持重的选官要求。王度走马上任，勤慎有能，不负众望。

王度才识的真正显露，是在朱元璋死后不久发生的“靖难之役”中。这一场朱家叔侄争夺皇位的战争，叔父燕王朱棣自称“靖难”，不过是“欲法周公辅成王耳”；而建文帝的大臣们则指其夺嫡篡国，群起口诛笔伐，其首领即为侍讲学士、一代大儒方孝孺。王度参与其中，“悉心赞划”，是“方党”的中坚人物。

貳

灭族沉家：一片忠魂被后世祀奉

战争开始之初，“惠帝（即建文帝）举五十万兵界景隆，谓燕可旦夕灭”，无奈李景隆庸懦怯敌。王度遂“密陈便宜”，举大将盛庸代之，“是以有东昌之捷。”后来，前线告急，王度“奏请募兵”增援。小河报捷后又亲赴前线“奉命劳军”。

正当王度不遗余力策划奔走之时，便遭抗敌无能误国之有的灭族谗言，最终被惠帝见疏。正如史家所评：“（王度）有智计”竟“用有未尽”，令人惋叹！

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铁骑千里长驱，奔突凤阳，方孝孺预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致函王度说要与他一起“誓死社稷”，一幕悲壮的史剧就这样奏响了苍凉的序曲。紧接着，金陵沦陷，建文失踪，百官皆降，成祖登基。方孝孺十族尽诛，惨烈绝伦；王度满门抄斩，王度当时年仅47岁，天下哀之。

最初，王度只是“坐方党谪戍贺县”，尚未至于论死。不久却又以“语不逊”而灭族。所谓“语不逊”，就是对当权者“恶毒攻击”。在杀人者看，这当然是咎由自取；但于被杀者，则又未必不是舍生取义。

王度的事迹被载入《明史》。而坐落在惠州西湖畔的孤忠祠、东江北岸的三王庙，直至清末民初，数百年间香火鼎盛，老百姓虔诚祀奉的是王度的一片忠魂。

叁

忠于所事：许国精神为士人见重

与王度一样被荐举任官的陈灝，表现也不俗。

陈灝，归善人，本名鲁生。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乡荐赴京上朝奏对，太祖朱元璋闻而奇之，赐名为灝。陈灝历官工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福建按察佥事，坐累谪戍兴州。永乐初获赦复官，被廷臣荐为浙江道监察御史，又谪凤翔尉。洪熙元年（1425年）复为左春坊中允，乞致仕，卒于家。方志评说陈灝“朴茂纯洁，抗直敢言，屡谪而不贰其行，乡邦贤之”。

“朴茂纯洁，抗直敢言，屡谪而不贰其行”，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实践“誓死社稷”的诺言，在王度、陈灝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正直品格和许国精神，是宋儒学说与岭南山水所共同孕育出来的惠州人文精神。他们正气凛然，令吏畏民敬，乡邦贤之，对后人有很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王度，作为惠州历史上第一个以身殉职的御史言官，他的“忠于所事而以身殉之”的精神，被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同时见重。

肆

榜样力量：王度后又出28名言官

出于深长的政治考量，明王朝自永乐后期开始，就逐步为方孝孺、王度等人平反。

嘉靖五年（1526年），广东提学副使欧阳铎、惠州知府顾遂“奉圣谕”在西湖崇道山为王度建祠（今准提阁附近），颜曰“孤忠”，香山黄佐及邑人郑维新均为之作记。黄佐以为此举“事关名教”，郑氏则明白指出，当道者的用意是“建祠以树风声，彰志以示方向”，这样一来，“民知劝矣。民劝，斯俗易；俗易，斯政成”。此亦显见，统治者对王度在惠州学子中的“导向作用”与“榜样

力量”，是有着充分认识和良好预期的。

考诸史实也确乎如此，在明代，王度之后，惠州学子登科入仕而成为御史言官者28人。仅以进士为例，明代惠州考中进士者45人，曾任御史言官者有17人，约占38%，这是个很高的比例。

在这些御史言官中，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坚持法纪而不惜以身犯险丢官弃禄者，更不在少数。这种情况，用明代惠州学者叶春及的话说，正是“名卿迭起，忠孝之臣，才节之士，后先相望”。

文脉
考证

明初举荐制一度替代科举制

明代官学的职责一方面是“行教化”，另一方面则是“育人才”，为国家培养各级行政官员。不过在洪武时期，学校教育侧重于“行教化”，与官吏的铨选还没有直接挂钩。特别是在洪武初年，朱元璋施严猛之治，大杀功臣，冤狱频发，惨遭株连杀戮者多达数万人。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

当时东莞伯何真已经死了五年，他的三儿子及许多亲属在此案中被牵连诛杀，惠州东莞伯何氏宗祠被夷为平地。正所谓“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令许多读书人视仕途为畏途，抱德怀才者多

有不为君用之志，隐居不出。官员缺乏竟成了一时亟待解决的难题。

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诏连行三年乡试，开科取士，中举者免会试，赴京听选。结果应试的大多是学问肤浅不更世事的后生少年，令朱元璋大为失望。他说：“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世者甚寡，非朕责求贤之意。各处宜暂停科举，别令有司举察贤才，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自此之后至洪武末，虽间行科举，荐举仍为选才取仕的重要途径。御史王度起初就是被举荐为官的。



插图/杜卉

报国雄武气魄
在惠州一脉相承

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素有“岭东雄郡”美称的惠州，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缚娄古国之文明。自南朝梁以后，特别是隋以后的千余年间，惠州先后为州（郡）、路、府、区、市等行政区所在地，成为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随着宋代儒学的兴起，书院在惠州遍地开花，两宋时期惠州地区便出了50多位进士。经济重心和人口的南迁，使得惠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同时文明进步，并逐渐走向鼎盛。至明代，惠州教育机构完善，师资力量雄厚，为国家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环境造就人，宋代儒家学说在岭南大地上生根发芽，与罗浮山、东江、西湖等山水交融，共同孕育出一种属于惠州的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明代最为显著。明代惠州士人，既有经国治世的“三尚书”叶梦熊、杨起元、韩日缵，也有无畏敢言的“四御史”曾守约、车邦佑、曾舜渔。他们以所学所能报效国家，不畏强权显贵敢于正义直言的雄武气魄，是惠州士人身上共同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

而且，这种报国雄武的气魄精神，一脉相承延续下来，在许多时期都得到展现。在晚明的函可、韩如璫、韩如淡，晚清的邓承修、江逢辰等惠州名人身上，都清晰可见。近代革命时期，惠州本地涌现出邓仲元、廖仲恺、邓演达、叶挺等一批国民革命家，他们在困难和强敌面前，不惧艰险，勇于抗争，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奋斗终生，这无疑是报国雄武精神的最好注解。

文

从方孝孺到海瑞：明朝士人的“硬骨头”精神

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史上，明朝留下的直观印象之一，就是皇帝嗜杀，尤其是开国者朱元璋，几乎杀尽了功臣；还有他的儿子朱棣，都是铁血之主。

而另一个直观印象是，明朝士人多有“硬骨头”精神。最为典型的是，在靖难之役后，因拒不与朱棣合作被“灭族”的方孝孺。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朱允炆重用方孝孺。靖难之役发动之初，朱棣的军事高参姚广孝曾出言请求朱棣，战后不要杀方孝孺，“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很快南京被攻破，建文帝下落不明。方孝孺见朱棣时，为建文帝穿孝服，在大殿内痛哭，并怒斥朱棣的墓位行

为。朱棣暴怒，方孝孺被处死、灭族。

而被誉为“海青天”的海瑞，除了清廉公正的一面，也有一副“硬骨头”。嘉靖皇帝朱厚熜晚年不理朝政，一心炼丹修道。官场腐败，地方官争献祥瑞称贺。

面对时局，海瑞买了棺材，并托给朋友照顾家人，随后呈上洋洋洒洒3000字的《治安疏》，直斥皇帝懒政、迷信，并摆下“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之类的狠话。

嘉靖这个已执政40多年的老皇帝，如何容忍有人如此犯颜，十分震怒，立即要杀海瑞，被群臣劝住。他听闻海瑞买了棺材上书，报了必死之心，其行为堪比商朝的比干，而自己岂能是纣王？嘉靖帝沉默良久，再读

《治安疏》，不禁叹息，终没杀海瑞。

《牡丹亭》作者、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大剧作家汤显祖，也是个有骨气的人。万历十九年（1591年），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当时的权臣，对万历登基20年的政治作了抨击。看到疏文的万历帝大怒，将汤显祖贬到了广东徐闻……

敢于“逆龙鳞”，不惜搭上身家性命，明代士人的骨气和胆气何来？

这大概与当时儒学的勃兴不无关系。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老树新枝”，在当时广为传播，流布民间，影响深远。作为儒学传承者的士人，其影响更是深入了骨骼血脉。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儒学讲仁义、讲道德、讲名节等，儒家知识分子以“君子”自称，往往有道德洁癖，爱惜羽毛，宁可牺牲性命以保名节。

同时，士人有家国情怀，宋明时期更甚，理学大家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张载别称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他们的崇高理想。

拥有这种道德和理想的人，在价值追求上，往往超脱短暂的自然生命，更在意千秋万世的声名、道义和天地正气，这也是南宋宰相文天祥遗留下来的精神大义。

因此，理学流布的宋明时期，文人士大夫多有一副“硬骨头”，这是精神力量的外在表现。

不过，这种硬气，在不同时期的遭遇不同。宋朝时士大夫与皇帝论政，争得面红耳赤，那是基于宋代君主的开明，“不杀文人”，尤其是在宋仁宗一朝，有“君臣共治”之誉。

但明朝是强权政治，从朱元璋铁血立国开始，就与宋朝是全然不同的政治氛围。士大夫再想以言犯上，结果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尽管如此，士人的骨气在明代依然可见。为了心中的道义和理想，他们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出来，发出令帝王都逆耳的忠直声音。

在后世，这些人被鲁迅先生称赞为“中国的脊梁”，他们“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鲁迅说：“虽是等于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

文脉
故事惠州两御史
接续斗权贵

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受社师儒的影响，明代惠州士人涌现出“三尚书”“四御史”“湖上五先生”等杰出人物。曾守约、车邦佑，连同利宾和曾舜渔，被邑人誉为“惠州晚明四御史”。据平海《曾氏族谱》记载：建文二年，一户曾姓人家由江西吉安府太和县迁至广东惠州府归善县平海城（今惠东县平海镇）落脚居住，繁衍子孙，百余年后出了一位进士，并成为有名的监察御史，他就是平海曾氏五世祖曾守约。

曾守约，字子如，归善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授江西监察御史，后升至广西巡按。在巡按广西期间，他多次及时举报当地政情，使朝廷得以及时处理，因而获得嘉许和重用。嘉靖十七年（1538年）山陵动工，武定侯郭勋总揽工程管理大权。史称郭勋“桀黠有智数，颇涉史书”，特有嘉靖皇帝的宠信，在主理皇陵工程中与一班党羽作威作福，谋取利益，挥霍公款，吃喝玩乐。对此，曾守约经常去巡视监督工程，使郭勋如芒刺背，想要除掉曾守约。

于是郭勋恶人先告状，诬指曾守约干扰工程，耽误进度。曾守约奋然反击，疏奏郭勋欺上放纵，又奏罢郭勋亲信监工郎中。由于嘉靖皇帝庇护郭勋，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曾守约虽获晋升为大理寺右寺丞，却也因此得罪了郭勋。不久，曾守约急流勇退，乞归养母，隐居养志，病卒时年仅46岁，葬于西湖浮碧冈（今西湖惠州宾馆小岛）内。碑文刻有皇帝诰命。大学士吕调阳为作墓志铭，称赞曾守约“先生秉宪象太微，瘴恶影善凛霜威”；对守约过早隐退而慨叹：“位不酬劳勇退，余不尽遗之谁？”又说：“弓裘旧业今继明，哉天道那能违。”

曾守约的子孙是如何承继了“弓裘旧业”，今已无考。但他与郭勋势力的对抗，被另一个惠州人勇敢接续，他就是浙江道监察御史车邦佑。

车邦佑字卿卿，原籍博罗泰尾村，后移居惠州府城。嘉靖十四年（1535年）中进士，授行人，迁浙江道监察御史。他为人狷介，好任气。当时武定侯郭勋交结权贵桂萼、张璁，恃宠骄横，植党作威，人多敢怒而不敢言。车邦佑总结同乡曾守约疏奏郭勋总监陵工时欺诈放纵而被打击报复的经验教训，先行在京城暗访，查“核京城内外诸勋戚店舍”，详列郭勋罪行，交台谏弹劾，郭勋因此而被问罪。在群臣交相弹劾下，郭勋终于被投入监狱，最后死于狱中。

惠州府城四牌楼（今中山北路）原竖有四座牌坊，其中一座牌坊正面刻“四奉敕命”，背面刻“世受国恩”，就是为车邦佑所建。

从王度、陈灝到曾守约、车邦佑，明代惠州知识分子以国家为己任的思想信念代代传承，形成了明代惠州人集体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文脉
观察报国雄武气魄
在惠州一脉相承

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素有“岭东雄郡”美称的惠州，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缚娄古国之文明。自南朝梁以后，特别是隋以后的千余年间，惠州先后为州（郡）、路、府、区、市等行政区所在地，成为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随着宋代儒学的兴起，书院在惠州遍地开花，两宋时期惠州地区便出了50多位进士。经济重心和人口的南迁，使得惠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同时文明进步，并逐渐走向鼎盛。至明代，惠州教育机构完善，师资力量雄厚，为国家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环境造就人，宋代儒家学说在岭南大地上生根发芽，与罗浮山、东江、西湖等山水交融，共同孕育出一种属于惠州的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明代最为显著。明代惠州士人，既有经国治世的“三尚书”叶梦熊、杨起元、韩日缵，也有无畏敢言的“四御史”曾守约、车邦佑、曾舜渔。他们以所学所能报效国家，不畏强权显贵敢于正义直言的雄武气